

为幸福 需要支付哪些成本

“我爹有的是钱，我不花谁花？”这样的说辞，元芳，你怎么看？
不管元芳怎么看，这样孩子的父母都会情真意切地如此表白：“我们辛辛苦苦这么多年，赚钱不就是给孩子花嘛！”如今在本地，有这种想法的人着实不少。它导致一种现象，就是奢侈消费年轻化日益严重。(11月20日《人民日报》)

奢侈与否在于 人对待财富的态度

校园比爹、拼爹，弥漫奢侈风，源于社会弥漫着这种风气。民间疯狂的奢侈消费，在于一些公权力可劲儿造式的消费观对之的助长。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正可从另一个侧面对奢侈现象，作多项解读。

在现代社会，公权力奢侈成风，显然是一种病态现象。“表叔”层出不穷，与作祟的面子思想相关，但更为体现本质的是：部分公权力的价值取向与其所宣称的东西发生了根本性的偏离。当公权力不造福他人，不造福多数人的时候，就一定要造福自己。

对奢侈品的迷恋，即便是虚荣心使然，是“好面子”使然，它也属于人性的范畴。一些人总是去找所谓成功的理由，总要摆出成功的样子让别人看，那么中看不中用的奢侈品必然成为最好的“证据”。一些人渴望人上人的身份，奢侈品也就自然成了它的一种象征。而从本质意义上讲，奢侈品能够代表这世间的稀缺品的某个方面，却代表不了人的品位，更替代不了人的内心所释放的魅力。它只是物质，表明了人格与精神。

现在，本土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地，越来越多的“富二代”正在成为奢侈品的拥趸，奢侈品消费逐渐呈现年轻化的趋势。这一代人先是通过奢侈品进行自我身份攀比，进而攀比家庭财富和社会地位。奢侈品消费强劲，除了显示“钱多人傻”这一社会表征，更显现愈演愈烈的贫富差距。

康德说，当一个人在使用财产时，非常慎重且踌躇，这既不是善行，也不需要本领和能力。依据康德的看法，往下追究一下，不是这些，又会是什么？应该说，是心态，是境界。获得了财富的人对待财富的态度肯定是不一样的，而境界则能决定他们重新取舍财富的方式。任何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力，别人无法干涉。去非理性消费也好，用财富回报社会也好，在多元化的社会里，无非是一种个人选择。但从另一个方面讲，虽然是钱花到哪儿都是花，但得到的结果却有霄壤之别。 伊文

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2012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显示，由于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展、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等原因，中国教育在整体不足的情况下，出现了局部的过度教育。

“过度教育”背后的 成功焦虑症

所谓“过度教育”是指一个人所受的教育水平大于他所从事的工作所需要的教育水平，比如说大学生淘粪工、研究生清洁工等，反之则是“教育不足”，比较典型的山区代课教师。

从地区分布看，东部和中部的过度教育发生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以北京为例，以用人单位评判为标准估算出的过度教育发生率为47.61%，以个人判断为标准估算出的过度教育发生率为54.92%。从行业层次看，过度教育发生率偏高的行业分别为金融保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视业、国家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农林牧渔业。如果从舆论上较为关注的“体制内”、“体制外”的所有阶层层次进行测算，结果会发现，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过度教育发生率较高，分别为60%和54.12%，而在企业和其他类型的就业单位中教育不足发生率较高，分别为55.58%和36.36%。

从某种意义上说，“过度教育”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市场现象。在一个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社会里，劳动力普遍倾向于流向经济发展水平高、公共服务水平高、工资待遇好、社保福利完善的地区和行业。在我国，很明显这些诱人的“地区和行业”普遍集中在中东部大城市以及“体制内”的机关事业单位里。在高等教育持续扩招的大背景下，劳动力的整体受教育水平同步得到了提升，水涨船高，随行就市，这些优势“地区和行业”自然就更加青睐高学历的人才，“让研究生干本科生的工作”何乐而不为？此外，在“关系文化”、“拼爹游戏”广泛存在的当下，你要想在北上广等大城市或“体制内”谋得一席之地，不进行点“过度教育”，恐怕连准入门槛都迈不过去。

过度教育虽然在短期内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就业压力、拉动教育消费，却具有影响深远的负面效应。首先，过度教育支配了有限的教育资源，让高学历者从事着低学历者可以胜任的工作，恰恰说明教育投资回报率极低，这对于教育资源短缺的我国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其次，过度教育与教育不足是一体两面，长期下去必将拉大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差距，加剧“马太效应”，不利于从总体上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此外，过度教育的氛围会使得毕业生为寻求理想职位而继续教育，周而复始地投入过度教育，往往会形成教育恶性循环，不利于人力资本潜能的发挥。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自觉地套上了“成功”的枷锁，留不到大城市回到小乡村就是失败，进不了“体制内”徘徊在“体制外”就不是成功，正是这种社会普遍弥漫的“成功焦虑症”逼迫着许多人去接受过度教育，以求“功成名就”被社会认可。

过度教育既是一种市场作用的结果，也是中国成功文化孕育的产物。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过度教育问题，最重要的是建立“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公平、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东西部地区均衡发展。在一个经济社会均衡发展、权利平等、机会公平、社会和谐的大环境中，成功将不再只有唯一标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努力实现自己的成功。 丁建庭

20日，一网站发布了《幸福的成本》博调研白皮书，共吸引了近千万网友参与。调查中，网友们普遍认为幸福的成本包括财富基础、社会保障、情感归属等，其中住房、医疗、教育和养老更成为网友心目中与幸福感最直接相关的“关键词”。(11月21日《北京日报》)

无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幸福方式。在生命的每个阶段，也都会有不一样的幸福。幸福作为一种感受，是有限的，不能随意挥洒，需要格外珍惜。幸福的最主要组成是什么？为了幸福要付出哪些成本？这些问题似乎每天都有人在思考，但每个人所得出的结论却不会一样，并且也不会像一湾清泉那样清晰。

幸福离不开现实境遇，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基础，脱离这些说幸福，就会显得很苍白很虚妄。譬如，一个人不能睡在大街上品味幸福，就是住在租来的房子里，也是为找到暂时的栖居。

因而，谈到幸福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众多网友们给出的答案是“房子”，就不足为怪。幸福是现实的、可感的，可以现实到可感到一所遮风挡雨的居所。

有房才有家，有房意味着安全感；有房才算立业，有房意味着归宿感。没有房子，有时相爱也不能成婚。因而，住房不但与婚姻、家庭等词汇密切相关，还与爱情、子女等词汇捆绑在一起，成为关系幸福成本的最关键物质。

伊朗哲人路巴哈认为，人类幸福的障碍是这些东西：民间风俗、生存竞争以及相互之间非人性的事。一些人嫁人，是为了嫁房子，这和深藏于潜意识中的民间风俗不无关系。没有人愿意做“房奴”，但现实中却有“房奴”存在。“房奴”不是人们自身选择的结果，高企的房价使得不是“房奴”的人被“房奴”。这些事情既关系到生存竞争之事，还关涉到既得利益集团与大众相互之间非人性的事。

亚里斯多德说，幸福在于自主自

足之中。医疗、教育和养老是民生发展的基础，也是幸福最关键的保障，这些都需要社会和个人成本的付出。从社会公平公正角度讲，公平配置医疗、教育资源，并让人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既是网友对现实的期待，也是人们实现自主自足幸福的根本条件。

在一些网友眼里，幸福犹如一头大象，有不同的层面，从多个角度看，都会看到不同的景象。叔本华说，人们的视野、活动、接触范围越窄，就感到幸福。如果人们广泛，就会感到烦恼，而且安全感也会大受威胁。因为，随之而来的担心、愿望、恐怖也会增加、激化。或许，人们的眼界、境界、人们对未来的担忧，人们恐惧的情感，等等，都是为追求幸福所付出的人生成本。可以说，向往温情、向往幸福是人性和生俱来，而只有在这个社会创造出更多的公平公正的制度条件，社会多数成员才会得到更多的自由实现及更多的幸福。 今语

美丽中国 不容“候鸟杀手”横行

枪口下、毒池边，白鹤殒命。罗霄山猎鸟事件还未了结，在天津北大港湿地保护区又发生东方白鹤被毒杀事件。近日，前往搜救东方白鹤的志愿者，在北大港湿地发现3处“人造毒池”，确认周边新增8具东方白鹤尸体。至此，共有21只东方白鹤死亡。

白鹤，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现存不超过2500只。这些不愿折翅的鸟儿，因季迁徙，飞翔是它们美丽的姿态。在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上，有些人视其为幸福之鸟、吉祥之鸟。但却有一些人，肆无忌惮地将魔爪伸向它们，仅仅视它们为“200元一只”的低廉禽肉活体，毒杀谋利。

白鹤之灾，缘于猎鸟贪吃之嘴。有钱、有闲、有交游者，有请吃、吃请需要者，驾车拉风、结伴出游，邀以美味，其乐融融；被添加剂、防腐剂、催熟剂等包围的城市人，在脑海中简单换算，以为野味即原生态，原生态即最佳营养品，节假日扶老携小，湿地一游，佐以美味，其情怡怡。

真像看一部《癞蛤蟆吃了天鹅肉》的蒙太奇电影：“天鹅杀手”给鸟儿投毒，野味店老板购买带毒禽鸟，一盘黄焖的天鹅肉，求食成癖者欢喜进食，但他们深受其害而不自知：毒伤肝脏，其害不可逆转，损失不可谓不大。

为什么许多人知道天鹅、白鹤等国家保护的动物，仍要寻寻觅觅、捕食后快？原因在于，恐怕在于动物保护虽有相关法律，但现实中执行力差，惩处力度低，缺乏震慑力和约束力。更重要的是，恐怕是许多人还没有生态文明的概念。这些年，我们的日子过好了，于是有人就以为物质富足，即意味着绝对的幸福。“我想吃啥就吃啥”，这是“穷出身”的想法，所以才会有求食天鹅肉的“暴发户”作为。

社会发展到今天，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尤其紧迫。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美丽中国”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新词。报告指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一方面说明了生态文明建设之路，任重道远；另一方面，也指明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

生态文明社会岂容“候鸟杀手”横行？如果我们能从思想上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并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个方面一以贯之，当白鹤齐聚引吭高歌，当鸳鸯悠闲觅食饮水，当美丽的大天鹅从西伯利亚飞抵我们身边，这样的中国，将会是一幅无比美妙的画卷，方当得起“美丽中国”的美称。 秦丹



11月17日23时许，在安徽省合肥市宿州路和淮河路交叉路口，一名醉酒男子模仿交警，指挥起交通来。而该男子的“指挥秀”不仅没能疏堵，反倒添堵，连前来劝阻的巡警也吃了他的自制“罚单”。(11月19日中安在线)

醉酒丑态，千奇百怪，有人笑，有人哭，有人钻桌底，有人爬餐桌，严重的还会发酒疯。可是，像这名醉鬼上路模仿交警指挥交通的，倒是很少见。酒壮人胆，在酒精刺激下，一些人往往会激发出特别的“潜能”，一饮而醉，醉后行为如果自娱自乐无伤大雅倒也罢了，可是很多醉鬼偏偏是“人来疯”，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展示醉酒丑态，甚至影响到公共安全。醉酒“指挥秀”这种行为，添堵倒是其次，倘若遇上马大哈司机或醉驾者，很可能被其瞎指挥左右而酿成交通事故。

贪杯轻则伤身出丑，重则误事伤命。看来，除了要严打醉驾，对醉酒闹事者也要严加惩处，否则，真不知道那些醉鬼会做出什么危险的举动来。 文/小强 图/春鸣

制度供给应跟上时代脚步

过去两天，对大学生村官任建宇来说，可谓一波三折。先是11月19日，重庆市劳教委以“处理不当”为由，撤销了对他的劳动教养决定，恢复了他的人身自由；后是11月20日，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为由，驳回了其申诉，讨说法未果。

在重庆劳教委“自我纠错”获得舆论的肯定后，人们更关注的是：法院怎么看？法律怎么办？

自任建宇被劳教以来，这一案件引发普遍关注：一个青年只是在网上转发了文字、图片，原创者未被追究，为何转发者却被劳教？一件印有“不自由，毋宁死”的文化衫，如何成为违法物证？

这些听起来有些荒诞的情节，让大家在关注一审法院裁定之外，更觉有必要探讨劳教案件本身。

有明白才有清白，有公正才有公信。如今任建宇恢复自由了，但其当初为何失去自由，依然缺乏明确说法。如果说任建宇发表“负面言论”涉嫌犯罪，那么当检察院不认为是犯罪时，有关部门却通过劳教制度限制其人身自由长达一年，是否合理？在国家多次重申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背景下，公民的基本权利如何避免“扣帽子”式的威胁？即便是公民表达权利被违法滥用，行政部门是否有单独甄别权利判定？

这些疑问的产生，源于我国现行劳教制度的模糊。自1957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以来，劳教制度已在我国施行50余年。随着我国

民主法治的发展，该制度已经显现出许多不足。特别在《立法法》等法律颁布后，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权力只能由法律设定，劳教已陷入不合法的窘境。加之劳教的审批权属于公安机关，在机制上缺乏应有监督，在实践操作中弹性十足，往往成为一些地方开设的“法律小灶”，甚至成为一些人打击报复的工具。正因如此，不久前，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改革劳动教养制度已成社会共识，目前正研究具体的改革方案。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根据经典理论，法治包含两个要素，一是有良好的法律，二是法律得到普遍遵循。其中“良好的法律”是根本前提。就此而言，只有确保制度供给跟得上时代脚步，确保法律规章不断与时俱进，才能奠定法治国家的前提和基础，才能让一切权力运行纳入法治轨道。 任民言

硕士生靠整容求职是自我歧视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认为整容、“变脸”之后就可以扫除一切求职障碍，无异于痴人说梦。硕士研究生靠整容求职完全是一种自我歧视。

求职难，这是眼下不争的事实。出现求职难的原因，一方面是某些领域的人才供过于求，一方面是某些行业出现就业歧视。就业歧视种类很多，如户籍歧视、乙肝歧视、性别歧视等。还有一些行业和企业对五官也提出了要求，因而催生了一些“人造美女”和“人造帅哥”。

就业歧视属于人为制造社会不公平，因而有专家建议废除制度性歧视，建立就业歧视审查机制，加快实现就业机会公平。然而，整容求职不仅与此背道而驰，而且是一种自我歧视。不可否认，有些招工单位属于“外

单眼皮”变”双眼皮、鼻子也“长”高了……为找到一份好工作，武汉大学硕士研究生三年级生曾凡(化名)花费上万元整容，他认为“变脸”后可扫除一切求职障碍。(11月21日《武汉晨报》)

貌协会”的，比如银行等服务行业，但并非所有用人单位都属于“外貌协会”。为了求职而刻意在自己脸上“动刀”，这是自己不相信自己、自己瞧不起自己。你属于“外貌协会”的，你看不起俺无所谓，此处不用人，自有用人处，这才是一种求职自信。俺有真才实学，还怕求职不成？

令人遗憾的是，整容求职不是个案，甚至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报道称，想找个工作前去整容的大学生不在少

数，武汉协和医院整形美容科刘嘉锋博士介绍，大学生占整容大军的三成，且人数以10%的增速在逐年攀升。求职靠整容，这显然是社会的一种悲哀。

一方面，社会要消除就业歧视，另一方面，作为天之骄子的有知识、有素质的大学毕业生，在求职问题上却在自我歧视，这如何实现就业公平？就业公平不能实现，社会公平从何谈起？大学生求职，自信和真诚更重要，认清自我、提早规划更重要，而不少大学生不是这么想的，而是天真地认为“变脸”后就可扫除一切求职障碍，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几十年前，文豪鲁迅大声疾呼“救救孩子”，难道在公平正义比太阳还光辉的今天，我们还要大声疾呼“救救大学生”？ 毛开云

白酒标准 国标不能“醉无语”

当白酒被媒体曝出塑化剂超标时，中国酒协就迫不及待地站出来辩护，并驳斥媒体“不负责任”。然而，在去年5月台湾地区曝出塑化剂风波后，酒协6月份就全面清查白酒中的塑化剂，结果是白酒基本都含有塑化剂成分。可令人不解的是，酒协却向公众隐瞒了这一消息。倘若不是现在在酒鬼酒被曝出塑化剂超标，那么这个结论是否仍然不为公众所知？为何会有这般截然相反的态度？公众有理由怀疑，某些协会已经成为行业的利益代言人。

酒协还声称，白酒产品塑化剂含量标准尚未制定，且中国白酒规模以上企业的白酒产品中塑化剂含量远远低于国外相关食品标准中对塑化剂含量指标的规定。这种说辞很容易让人想起三聚氰胺事件。在三鹿奶粉被查出含有三聚氰胺后，权威检测机构部门和食品专家都表示，在奶粉正常检验标准中，没有三聚氰胺的检测项目，也没有特别有效的检测方法；在毒胶囊事件中，铬含量的检测也是标准缺失。然而事实证明，当时检验标准中没有的，而是天然地认为“塑化剂特定迁移”上的管理，而不是明知白酒都含有塑化剂，却有意隐瞒不报。

有意思的是，酒业协会于去年12月曾向酒企发布通知，明确要求白酒企业禁止在白酒生产、贮存、销售过程中使用塑料制品；在今年4月和7月中国酒业协会的相关会议上，严控白酒产品塑化剂含量两度被提及。何以到了现在，却推翻自己的立场，为白酒中塑化剂的含量辩护呢？

白酒基本都含塑化剂，而且酒越高档含量越高，这一事实对于消费者来说，无法不担心，毕竟塑化剂是有“前科”的，并被列入了“黑名单”。因而，尽管中国酒协表示“白酒生产过程中自身发酵环节不产生塑化剂，白酒产品中的塑化剂属于特定，主要源于塑料接酒桶、塑料输酒管等”，但本着行业健康发展的原则，酒协也应规范酒企在“塑化剂特定迁移”上的管理，而不是明知白酒都含有塑化剂，却有意隐瞒不报。

更重要的是，既然眼下的白酒国标中还没有塑化剂含量的标准限定，那么中国酒协当积极推动相关部门，尽快在白酒国标中补上这个漏洞。而不能以“没有标准就推断超标是不负责任”的不负责表态，为酒企开脱。至于酒企也应该本着对消费者负责的态度，别光顾着赚钱，然后在广告招标中大把撒钱。

而应严加管理，把塑化剂用量控制在最小范围内。酒越高档，塑化剂含量却越高，这何尝不是对中国白酒业的一大警示！

当然，眼下还只是听到酒协的一面之词，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消协也应主动出声，而不是坐视不管。 李龙